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五五八期 ——  
(二〇〇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702f)

---

【专题研究】太阳最红的年代 (讲演录, 上篇)	辛灏年
【文革点滴】电影《海霞》诞生记	袁成亮

---

小启: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 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 <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 【专题研究】

太阳最红的年代 (讲演录, 上篇)

• 辛灏年 •

前言: 我与文革

各位留学生和华侨朋友, 各位前辈和人士:

首先我要说明的是, 我不是文革史研究专家, 对文革不具备专门的学问和细致的研究。所谓“术业有专攻”嘛! 但我毕竟是一个半途出家的历史研究者, 对中国现代史, 和对中国现代历程有着深刻影响的世界近代历史, 有着一定范围的知识, 和一定程度的了解。而文革, 毕竟又是中国现代历史的一个部份, 它的发生、过程与结果, 不可能与中国现代史及世界近现代史毫无关系, 更不可能与近现代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特别是与世界共产革命的两个祸首——马克思主义和已经崩溃的共产党俄国——没有关系。因为, 大家都知道, 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恶性传播, 没有前苏联的扶植、命令和指挥, 中国不会有共产党, 不会发生共产革命, 更不可能篡立一个马列中国, 也就不可能出现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因为, 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这么一个“东西”。

其次我要说明的是, 本人是文革的经历者。但我是一个“文革逍遥派”。当然, 真要说到“逍遥”, 那也是假的, 成天提心吊胆, 又怎么可能真正做到逍遥自在? 所谓逍遥, 就是没有参加造

反，没有斗争过别人——不得不和大家一起参加斗争大会时除外；不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背诵毛主席语录——必须和大家一起学习、背诵的时候我还得装模作样地学和背；只要能够不戴毛主席象章，就坚决不戴——必须别在胸前的时候我也不敢摘下来……。原因，开始时，是别人不准我革命，因为我是右派份子的儿子，是黑五类；后来是我自己因为厌恶而坚决“不参加他们的革命造反”（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阅对我的采访录——“逍遥派说文革”一文）。再加上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派们大闹“革命”，而把我这等人忘却了，我便有了机会，认真阅读红卫兵造反派抄家、焚书、坑儒、斗民中间残存下来的“封资修”，再就是写作和拉琴，虽然也是“写了又烧，烧了再写”，原因是绝不敢保存下来。所以，我对文革和造反缺少感情，用文革造反派的话来说，就是“缺少某种革命精神”，却对我今日反思文革有利。因为我没有必须为自己的“文革行为”进行辩护或辩解的感情来由。另外，我们家虽也在文革中遭遇“家逃人散”，但毕竟还不是“家破人亡”。我的父母毕竟还是寿终正寝。我那个在文革中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哥，虽曾被造反派斗争得要自杀，但毕竟被家人拦了下来，后来还有很大成就。所以，从个人利害出发，我对文革的感受，也不至于过于激烈。这自然能够使我相对地冷静一些。我看了陈炯明的公子陈定炎先生为其父写的“翻案巨著”，便是全面地歌颂其父和全盘地辱骂孙文（顺便说一句，现在他的书成了中共“放言、放人”到海外大肆恶攻孙中山的“主要历史证据”）；我知道另一位国民党后人，一个很有历史修养、拥有丰富现代史知识的学者，在为其祖父作传时，凡是对的事情，便全属于他的祖父；凡是错的事，便全属于别人。这些都使我深知，当事人或当事人的后人，在回忆甚至研究往事时，难免会感情用事。而一旦感情用事，就难免会有些不客观了，就不说有些人还不仅仅是感情用事那么简单。我以为，这也是我这样一个有文革经历的研究者所必须注意的，哪怕我只是一个“文革逍遥派”。

正因为如此，我今天将努力不从感情、观念、观点出发来反思中共文革。我说努力，因为我知道，这很不容易。对于共产党发动文革的空前罪恶行径没有看法，不深恶痛绝，那才叫不正常，也叫没有良知。

我将在今天的讲演中，勉力为大家勾勒出中共文革之所以发生、发动和为中华民族大造其孽的“来龙去脉”，也就是勾勒出一条文革的“基本线索和简单线索”。希望大家，不论是文革经历者，还是没有经历过文革的年青朋友，都能因一条较为接近真实的历史脉络，而作出自己的客观判断，或进一步去作自己的研究。倘能如此，我就算是尽了心了。

这是我的开场白，也是多余的话。今天，我将围绕着文革讲十二个问题，就算是我个人粗浅的反思。

## 上篇

### 一、中共彻底否定文革了吗？

现在有一个理论，是说“因为中共彻底否定了文革，所以我们不能完全否定文革”。我有些不以为然。就不说这还是毛泽东那句“最高指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翻版。单单说在事实上，中共根本就没有彻底否定他那个“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我说中共之所以没有彻底否定文革，有这样几个理由：

#### 1、中共与文革的关系——文革是中共中央决定发动的

我们首先要明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中共中央决定发动的。

第一，中共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曾先后由中共中央建立过两个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第一个是

在1964年7月初，中共中央曾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成立了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领导小组。从此，文化革命就首先在文化界展开起来了。我后面会详细说到。第二个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则建立于1966年5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因为这次会议打倒了前文革小组的几乎所有主要成员，还揪出了所谓“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阴谋反党集团”，所以，中共中央才决定成立第二个文革领导小组，它的成员则是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和姚文元，都很快就进入了中央政治局。他们这五个人，有三个人成了后来的所谓四人帮成员。

第二，中共正式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始于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发动文革的“516通知”，也是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的。也就是说，是中共中央决定发动的。所以，不论文革是不是毛泽东发动的，在决议上，在程序上，他都是由中共中央及其政治局决定发动的。所以，在谁发动了文革的问题上，无论如何也撇不开中国共产党自身。至于康生、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等人，都是共产党，更是文革期间中共的核心领导成员，而不是国民党或其它任何一个党的成员，我就不说了。

## 2、毛泽东与中共的关系——毛是中共的领袖和主席

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就是现在，一些文革的经历者和文革的研究者们，常常都把文革的发动归咎于毛泽东一人，却忘记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第一，是他们忘记了毛泽东乃是中共的领袖，从1935年遵义会议算起，到1966年文革发动，毛泽东已经作了中国共产党的31年伟大领袖；从1945年中共“七大”算起，到文革发动，毛泽东已经做了21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主席。所以，不论是对外还是对内，毛泽东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代表。也就是说，毛代表了共产党，共产党以他为代表。换句话说，毛泽东做的事，就是共产党做的；共产党做的事，也就是毛泽东做的。这是天经地义的，所谓“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文革后的中共中央当真要彻底否定文革，就必须彻底否定中国共产党自身，起码是要否定文革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但这是中国共产党做不到的，也不敢做到的。因为，直到今天，他还在吹嘘自己一贯是“伟大、光荣、正确”。

第二，正因为如此，当邓小平要搞改革开放，而不得不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否定毛泽东的时候，他只能说，毛是“三七开”。也就是“三分过，七分功”。到了1981年，他又忽然象是大梦初醒似的对全党说道：“我们决不能否定毛泽东同志。如果我们否定了毛泽东同志，就等于把我们党、把我们自己全部否定了……”，从此，他非但不再否定毛，甚至还要求把所谓的思想解放运动，解放到“毛泽东的科学思想体系里面去”。2006年，中共“光明日报”网站在已经发表了一系列批判辛灏年的文章之后，又发表了一篇评“辛灏年现象”的文章，这篇大批判文章的作者，声嘶力竭地叫嚷说，“我们就是不能否定毛泽东，不能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因为，毛泽东曾多次地发表过一个“最高指示”，他说，“我一生只做过两件事，一是打倒蒋介石，二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如果把毛泽东发动文革彻底否定了，就等于否定了半个毛泽东，那就不是“三七开”，而是“五五开”了！就不说，中国大陆对历史的反思，也已经把毛泽东“打倒蒋介石”到底对不对的历史疑问，尖锐地摆到了共产党的面前。今天我不说了。如果我说了，那毛泽东就是“十、零”开，就是“只有罪行，没有功劳”了。

所以，我才说，中共根本没有彻底否定文革。因为，他一是不能彻底否定毛泽东，二是更不能彻底否定共产党。因为否定了毛泽东和共产党，就连他们自己都全部被否定掉了！中共在实际上，是把文革藏进了保险箱里面。不是“不愿显宝”，而是“不敢显宝”。因为，文革这个“宝贝”不仅可怕，而且会让他丢脸、丢丑，甚至会给他带来危险或危机。我们只有认清了这个要害，才能明白，今年虽值中共发动文革四十周年，中共非但自己不作“纪念”、也绝不容许中国的老百姓反思和批判的原因。倘使中共真是彻底地否定了文革，那还要把它藏着、掖着做什么呢？至于有些人在海外糊里糊涂地喊着要“纪念文革”，我听着也是有些纳闷的。因为，文

革还有什么可以“纪念”的呢？对文革只能是反思、是研究、是批判、是否定，是接受这一史无前例的惨痛历史教训。

## 二、中共将政治浩劫定名为文化大革命缘由

众所周知的是，文革确实是一场“革命”，因为，他革掉了太多的命。它不仅革了千千万万无辜百姓的命，而且革了许多共产党人自己的命。但是，中共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浩劫”，为什么又要被他自己称做是一场“文化大革命”呢？它跟文化到底有没有关系？又有着怎样的关系？

### 1、文化从来就是共产革命的工具玩偶和一部份

必须首先搞清楚的是，中国共产革命是世界共产革命的一个部分。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国际专制复辟势力的一个部分”。这个世界共产革命，在理论上早就由马克思提出了“要与一切传统观念决裂”，以建立所谓无产阶级文化的观念。在列宁十月“背叛”成功、并且篡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党主”专制的国家之后，文化就更是公开地被当成了共产党、共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和玩偶。

早在1919年之前，列宁就已经规定了文学的“党性原则”、即“党的文学”和“党的文化”原则，规定了“文化和文学必须是属于党的”。他的著名论文“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就为其后各国的共产党规定了“文学和文化必须由共产党来组织和领导，必须是共产党自己的文学和文化，必须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就是说，文化从思想到艺术，从主题到内容，从内容到形式，都必须为共产党所“专有”，为共产党所“专用”，这也是史无前例的。列宁的名言，也是中共所津津乐道的，就是“文学是整个共产主义革命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1919年，列宁在前苏联建立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这个文化协会的宗旨就是：“号召阶级斗争、鼓吹无产阶级革命、规定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创作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而它的口号竟是：“恐吓阶级敌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它的行为则是：“打击敌对文学、批判自由文学、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队伍”。高尔基的名言就是：“敌人不投降，那就消灭他！”无产阶级文化的血淋淋的形象，就这样为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喊叫出来了。

后来，斯大林根据列宁的教导，根据前苏联国内现实的需要，又具体地提出了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将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及其必须“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原则，进一步推展到了“歌颂社会主义、歌颂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和“鼓吹阶级斗争、鼓吹无产阶级专政”的范围和高度。文化，在斯大林的手里，终于完全地变成了“革命和专政的工具及玩偶”。

### 2、中共和毛泽东将文化当成诱发政治运动的阴谋手段

中国共产党和他的领袖毛泽东完全地继承了列宁和斯大林的衣钵，在他们疯狂地发动中国共产革命和残酷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岁月里面，非但以列宁和斯大林为榜样，而且创造性地把文化当成了可以任意使用、任意玩弄的的工具和玩偶，直到把文化当成他们发动历次政治运动以整杀人民、甚至是整杀自己党人的血淋淋手段。

1927年，当斯大林直接领导的中国共产革命遭遇失败之后，前苏联为了能够重新发动中国的共产革命，首先在中国所做的，就是发起“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于是中共首先提出了“创作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文学为第四阶级服务”的口号。然后就为紧密配合斯大林一再交给中共的三大革命任务——“发动武装暴动、号召土地革命、建立认前苏联为祖国的苏维

埃政权即“苏区”，篡立旨在分裂中国的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他们不仅在上海建立了直接由中共中央文化委员会领导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即“左联”，宣誓自己是“胜利不然就死”和要“进行血腥斗争”的文学，甚至创作小说来公然号召“杀光国民党，以造成一个赤色的天下”。请大家参阅共产革命作家胡也频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所公开出版的长篇小说《到莫斯科去》，及其他共产派作家的作品，就会一目了然。

上个世纪40年代初，中共和毛泽东在延安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以准备夺权打天下，同时还在理论上划清了“歌颂和暴露”的问题，即要求“革命作家”都要歌颂“不抗战、假抗战和正在全面准备内战的延安”，却要暴露和鞭鞑“正在坚持领导艰苦抗战的重庆”。大家有闲暇的时候，可以读一些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初共产派作家们的“革命作品”。至于四十年代末期，当“毛管区”的共产党正在发动“打天下”的内战时，共产党又是怎样发动他们那些自由地生活和创作在“蒋管区”的革命作家们，在理论到创作上，利用一切形式揭露和抨击“国民党反动黑暗统治和国民党反动派是怎样要发动内战”的。对此，只要翻一翻中共御用文人所写的“文学史”，就会一清二楚。

50年代，中共和毛泽东提出了“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也就是要用“文艺来为他们复辟专制、架构共产专制极权制度服务”。为此，他们便用文艺来“教育”人民必须“与一切传统观念决裂”，籍以否定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更用文艺来宣传阶级和阶级斗争，籍以达到他们要用“阶级性来取代和消灭人性”的共产革命目的；特别是用文艺来进行所谓的“革命传统教育”，迫使文艺家们大量地制造具有历史欺骗意义的文学艺术作品，如著名的“金陵春梦”、“青春之歌”、“红岩”等等。与此同时，还密切地将文艺和毛泽东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政治运动相结合，使文学和艺术成为歌颂共产党，歌颂毛泽东，歌颂社会主义，歌颂他们的残暴革命和残酷专政，歌颂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工具和玩偶，从而欺骗了整整一代人的思想、扭曲了整整一代人的心灵。

60年代，中共提出“文学要反映阶级斗争的现实”，为毛泽东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作证”，几乎将所有的文学和艺术都批上了阶级斗争的血淋淋外衣；同时开始大面积地制作“造神文学”，即神化毛泽东，树立毛泽东在天上和地上直至在全世界的绝对权威，以为毛泽东要夺回在党内失去的权力制造革命舆论，对此，我将在后面详细地予以说明。

至于文革中的文艺发展，就不必说了，一句“三突出”的革命创作方法，倒真的是将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创造性地发展到了“人间的顶峰”。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有一句最高指示，叫做“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因为他认为小说“刘志丹”歌颂了刘志丹的陕北红军，而贬低了他。其实，共产党和毛泽东早就在利用文化为他们的“夺权和专政”服务了。特别是“解放后”，文艺更是成了共产党和毛泽东整人和杀人的“革命法宝”之一。从1949年直到1976年毛泽东死，他利用文学、利用文艺来打击“阶级敌人”，打击那些不够听话或听错了话的“文艺走狗”，打击曾在“解放前”为他们大效犬马之劳的共产派、即所谓左派文艺家们，早已为无数文艺家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所证明。至于以批判电影“武训传”、镇压“胡风反革命集团”、斗争文艺界的右派、批判“中间人物”论、批判“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批判电影“桃花扇”、批判电影“早春二月”等等为手段，来寻找借口，藉以在党内和党外引发整人害人的政治运动，同样是举不胜举。但它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实为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所仅见。

### 3、文化终于成为中共发动文革的藉口与突破口

文化（包括学术），在中共和毛泽东手里，终于成了他们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突破口。换言之

之，文化一如既往，成了中共和毛泽东藉以发动政治运动的有力工具和阴谋手段。还是让我们用事实来说话。

在学术上：

1963年，投机的戚本禹在《历史研究》杂志发表了批判李秀成文章。戚开初只是认为中国正在“防修反修”，于是他就想从近代史上找到同类例证，以影射彭德怀晚年反毛也是“晚节不终”。他当然是想投机，直到今天，中国类似的学术文化人仍然是大有人在。文章发表后，他受到周扬、翦伯赞及史学界的强烈批评，戚甚至已经准备写书面检查。未想，年底，毛妇江青居然亲自找戚谈话，说“你给党做了重要的事情，主席表扬了你，很满意你写的文章。主席认为党内叛徒问题始终未能解决，你的文章提出这个问题，为党立了一功，你可别骄傲，要继续写”。显然，他在有心投机、未敢邀宠之间，被正要寻找借口和突破口的毛泽东惊喜地发现了“他的存在和意义”。

1964年，戚本禹发表第二篇论文，干脆明确地提出了叛徒问题，从李秀成、汪精卫、彭德怀到赫鲁晓夫，他都大批特批，其势汹汹，顿时在学术界引起纷乱。

1964年7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点名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开始遵旨在理论上掀开发动一场文化革命的绊脚石。学术界的大批判风由此而全面兴起。

1965年12月，《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公开批判翦伯赞，要遵旨打倒历史界的拦路虎。

1967年4月1日，文化革命开始后，他“终于”发表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开始公开影射刘少奇的所谓历史问题。第二年，刘少奇终被打为“叛徒、内奸、工贼”，戚可谓功劳不大。因为“叛徒”问题，恰是毛要整杀刘少奇的籍口和重心。而且也正是有了叛徒这个罪名，毛才将由刘少奇借安子文之手所控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彻底打翻，并由此而抓出了六十一个共产党叛徒所组成的“叛徒集团”，即刘少奇的所谓嫡系人马。至于开始曾批评过戚本禹的周阳、吴晗和翦伯赞，吴和翦均在文革中遭遇了批判和斗争，并因此被逼自杀；周扬则在文革中被首先斗争和打倒……

在文艺界：

1963年3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5月6日、7日，《文汇报》发表《“有鬼无害”论》，点名批判了孟超的剧本《李慧娘》和繁星（即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从此开始在报刊上公开批判文艺学术界不抓阶级斗争的修正主义代表人物。这显然是一个信号。

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部的一个内部刊物上写了一个批语，说：“文艺界的人数很多，问题不少，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又说：“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随后，根据这个批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及其所属各协会开始整风，实际上则是文艺界的文化革命已经开始。

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又在文艺界整风报告的批语中指出：“文艺界各协会和它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15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文化部和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及所属各协会再次进行整风，并立即对一些文艺

作品、文艺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一步发动了政治批判。文化革命的批判和斗争已经在文艺界展开。

1964年7月初，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中共和毛泽东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组织领导阶段。只是这个文革领导小组的领导者们，不合毛泽东的意，还是刘少奇的人。

1965年4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整文化部领导问题的批复》，公开免去了齐燕铭、夏衍等在文化部的领导职务。也就是说，在文化界已经有“走资派”率先被免去了“官位”，被打倒了。

1965年11月10日，在毛的亲自策划和江青的直接介入下，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一文，开始直接将文化大革命引向了残酷的政治斗争。明眼人都看出来，又一场残酷的政治整杀就要漫天漫地地发动起来。

1966年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杭州三次同康生、江青等人谈话，说：“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市委；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说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指彭真），并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担任写稿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人民日报立即开始揭发批判“三家村”和“燕山夜话”以及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民间连儿歌也编出来了，到处都在唱“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个坏蛋是一家……”文化可以被用来“运动群众”发动文革的巨大“优势”，已经充分地展现起来了。

1966年4月11日，中共中央批准了经过毛泽东修改和同意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个“纪要”，是江青在2月2日至20日，于上海邀集解放军的四个人，就部队文艺工作问题进行座谈之后写成的。3月19日，毛泽东亲自作了修改，同意江青将“座谈纪要”送给林彪。不久，林彪又以中央军委的名义报送中共中央审批。该“纪要”认为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纪要”声称：“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这个“纪要”不仅表明了毛泽东要把这根“黑线”全部拉出来，更反映了毛泽东要以文化为突破口，发动一场“政治浩劫”的决心。

#### 4、文革本身就是一场“革中华民族文化之命”的革命

历史的事实是，文革从开场到结束，中共始终继续文革前十七年“否定民族历史、批判民族文化”的做法，继续在马克思“要与一切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外族反动思想教条之下，号召“破四旧、立四新”，公开地、疯狂地和史无前例地否定、践踏、焚烧和毁弃我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从黄帝陵到孔庙，从宗教庙宇到文物古籍，绝大多数都遭遇了文化革命的毒焰，它们几乎被红卫兵和造反派破坏无余。他们在全国各地“冲击寺院、古迹，捣毁神佛塑象、牌坊石碑，查抄、焚烧藏书、名家字画、仿古工艺品；砸毁文物，烧戏装、毁道具；禁止信徒宗教生活，强迫僧尼还俗……以北京为例，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北京保存下来的6843处文物古迹，在80年代的第二次文物普查中，竟有4922处被毁，其中绝大多数毁于文革中。被毁的文物古迹中，最严重的是古代建筑、各种塑象和石刻石碑。共计有200多座古建筑被拆毁、拆除，700多尊佛象被砸毁，120多块被毁弃……。”与1871年巴黎公社反扑刚刚重建的法兰西共和国（第三）的造反暴动中，曾大肆地抄砸焚毁巴黎的文物古籍、宫殿庙宇相比，毫不逊色；说它是一场“要革中华民族文化之命”的革命，非但毫不虚夸，而且空前绝后。

## 5、文革疯狂地革掉了无数中国文化人的性命

毫不夸张的是，整个文革期间，共产党和毛泽东，还有他们亲自指挥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在对文化的破坏、毁灭和对文化人的斗争、批判和迫害上，不但继承了文革前十七年一贯是“绝不手软”的做法，而且将它发展到了历史性迫害的顶峰。既使文化遭到了史无前例的破坏，更使文化人遭遇了亘古未有的残酷整杀。由此，文化人成了文革中受害最深、最长和最惨痛的一群。多少著名的作家、艺术家、演员被活活迫害而死，多少无辜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因被强加上了莫须有的罪名而惨遭批判和斗争。仅上海音乐学院在文革中就有200名音乐家被迫害身亡。三、四十年代为共产党打天下曾“功勋卓著”的共产派文化人几乎被一网打尽。被共产党封为“人民作家”的老舍、人民演员的舒绣文、上官云珠等一大批作家和艺术家，只能含恨诀别人间。安徽的著名黄梅戏演员严凤英，虽已被逼自杀，尸体还要被军代表和造反派勒令“脱光解剖”，要“寻找向台湾国民党发报的发报机”……。据此，难道说文革还不是一场残暴地革了太多中国文化人性命的“文化大革命吗”？

今天，当文革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十年的时候，竟然在海外的“纪念”中，出现了“对文革中那些被迫害至死的普通人没有必要研究”的说法，和整个文革虽然“死伤巨万”，竟“只有被迫害者、而没有迫害者”的“研究”，实在令人匪夷所思。我似乎骨哽在喉、不吐不快的是：与文革中任何一个被迫害至死的作家、艺术家和文化人相比，则文革中的任何一个“革命造反有功”的红卫兵和造反派，都显得无足轻重。就不说千千万万同样遭遇了迫害和逼杀的学者、科学家和知识份子这些“普通人”了。

### 三、中共发动文革的“表面政治藉口与内在政治原由”是什么？

#### 1、表面政治藉口：“外亦有修”和“内亦有修”

中共和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表面政治藉口，就是因为“外亦有修、内亦有修”，和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所谓外亦有修，就是指苏联出现了修正主义、即否定了斯大林主义，放弃了阶级斗争，要共产党与资本主义搞“三和一少”。于是，从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曾联名对前苏共中央发表了9篇公开信，即评论员文章。因此，中苏两党和中苏两国关系急剧恶化。当然在实际上，一是在斯大林死后，中共和毛泽东要和前苏共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权；二是赫鲁晓夫在前苏共二十大的报告中否定了斯大林，造成了中共党内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危机；特别是毛泽东的“三面红旗”遭遇全面失败之后，党内以刘少奇为首的政治势力，显然对他采取了“逼宫”的行为。

所谓内亦有修：毛鉴于上述情形的出现，终于苦思冥想地提出了“党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领导人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崭新政治概念。

1964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陈正人“关于洛阳拖拉机厂蹲点报告”的批示中，首次提出了所谓“官僚主义者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的说法。他说：“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

也就是说，毛泽东不仅找到了“罪名”，而且找到了“治罪”的方法，即崭新的“革命概念”。



这个方法和概念就是指：既然外部和内部都出现了修正主义，所以，就要在“不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即共产党专制的前提条件”之下，要继续发动革命。而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号召群众起来打倒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即“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十七年间，因共产党在全中国的罪恶统治，而造成的“党和民”之间的深刻矛盾，及其不容爆发的冲突，竟然成了毛泽东要继续革命的“发动力”。也就是说，在“革命的对象”已经摆在毛的面前时，毛终于找到了“革命的力量”，并找到了“革命的契机和主题”。更何况，他那个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革命的大方向”，既然早就是共产党“革命专政”的主体内容和根本目标，谁还敢公开反对呢？

## 2、内在政治原由：“天无二日”和“国无二主”

如前所述，苏共二十大批判了斯大林也否定了斯大林，特别是明确地提出了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反对个人崇拜现象，将列宁死后，前苏联所出现的残酷专制，归咎于斯大林的个人独裁和残暴的斯大林主义。甚至直到今天，在俄国历史学界谈到前苏联的罪恶历史时，竟仍然将苏共的罪恶全然并于斯大林一身（参阅《共产主义黑皮书》，英文版名：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哈佛大学出版社）。

苏共二十大刺激了中共和毛泽东，几乎是同时爆发的“匈牙利事件”更是刺激了神经已经紧张的毛泽东和中共。于是，一场也要反对个人崇拜和更要维护个人崇拜的斗争，伴随着一场要拼命维护共产党专制统治的斗争，就在风云际会之间，悄悄地、却又是激烈地表现出来了。

为汲取苏共的教训，中共于1956年召开的“八大”提出了要反对个人崇拜。邓小平在八大政治报告中，明确地提出了在中共党内也要反对个人崇拜；连第一个喊出了“毛泽东思想”、第一个对毛泽东提出“个人崇拜”理论的刘少奇，也在报告中屡屡提到了中共要反对个人崇拜。

然而，在第二年、即1957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则相反地公开提出：“正确的个人崇拜，还是需要的。”毛与刘、邓开始了“针尖对麦芒”。

不幸的是毛泽东。他的疯狂的大跃进，把他的总路线、人民公社一起拖到了绝境。中国大陆在1959到1962年间，据官方统计，竟然在毛的三面红旗之下饿死了整整4300万无辜人民。而且“绝非天灾，全是人祸”（请参阅丁抒教授的《人祸》一书）。

1962年，在北京那个连县委书记都能参加的七千人大会上，倒了“三面红旗”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被迫做了检讨；自1959年起，就已经担任了国家主席的刘少奇，终于在全国人民高举毛、刘“两张画象”和高喊“毛主席万岁、刘主席万岁”的“两个万岁”声中，不仅成了一国并立的“二主”；而且，六四年，他还把毛主席自己说的，“三天不学习，就赶不上刘少奇”的“最高指示”，已经口头传达到了全国各基层党支部。

其间，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面根本不向党的主席毛泽东汇报工作，对他的“最高指示”置若罔闻；中央组织部已经完全被“后来挖出来的党内叛徒集团”所掌控，北京市委被刘少奇的得力干将彭真弄得毛不仅“连水也泼不进”，而且“连针也插不进”；中共中央的绝大多数委员、全国各省委、直辖市的第一书记，几乎全部为刘所安插……。连李大钊的儿子李葆华被任命到安徽担任省委第一书记，刘少奇都要亲自乘火车将他送到蚌埠，“以示关爱”……。本来是毛泽东要发动的“四清运动”、即所谓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被第二夫人王光美的“桃源经验”，扭曲了原来是“要整走资本主义道路领导人”的毛式四清大方向……。

此时此刻，毛除掉“知趣”，带着伟大领袖的名号和红太阳的美称引退政坛养老，就只有

决心与刘少奇政治集团“拼死一搏、以决胜负”了。好在毛泽东手里有的是宝贵的“历史经验”；有包括刘少奇在内的中共党人为他所造就的——“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之伟大领袖”的崇高地位和神秘形象；更重要的是，曾专门领导共产党地下工作的“白区工作模范”刘少奇，对毛从未放过手的“地上的军队”，几乎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一场巨大的政治内讧，显然已经到了非爆发不可的时候。

#### 四、中共敢于发动文革的“历史经验”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要发动一场名谓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大浩劫”，并非没有历史经验可以汲取。

##### 1、中共拥有列宁斯大林制造暴乱内讧的成功历史经验

第一、毛泽东深得列宁的政治谋略，即布尔什维克的夺权经验——“用小组织搞乱大社会”。因为一个有坚定目标、坚定信念、严密组织、大胆谋略、并敢于不择手段的“小组织”，相对于一个思想分歧、信念犹疑、组织松散、没有策略，并且不善策划阴谋、不敢不择手段的大组织和大社会来说，这个小组织常常是难以想象地充满着“战斗力量”。而它对大组织和大社会进行战斗的拿手好戏，就是先搞乱它，再征服它，就是“乱中夺权”。列宁用这个办法，对内搞垮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人数众多的孟什维克派，更搞乱了二月民主革命成功后的整个俄国社会，并终于在他所一手制造的大混乱中，推翻了俄国二月民主革命所创建的“俄罗斯第一共和国”，夺取了政权。

中共和毛泽东的革命，不仅在列宁和斯大林的把手教唆之下，深悖其理，大获成功；而且毛泽东的所谓“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的革命体会，就更是得自于列宁的“真传”。所以，毛泽东在为了对付刘少奇的“大块”党内力量时，也决心要如法炮制。“真理常常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就是毛要发动文革、摧毁党内多数派的重要由头之一；建立一个以他为首，以毛妇江青为“狗”（江青曾在法庭上高叫“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和以林彪、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等野心家为核心的阴谋小集团，就是他所建立的一个严密坚定犹如“黑帮”式的“小组织”；然后就是以“策划阴谋和不择手段”来搞乱对方的阵脚，搞乱自己的党，直至搞乱整个社会，则是他的“伟大战略部属”；再就是不顾一切牺牲地直奔自己的夺权目标，便是他以“小组织”进行血腥战斗的又一次“革命实践”……。毛泽东正是用这种手段打倒了蒋介石；现在，他还要用这个手段来打倒刘少奇。何况他毕竟还有一个“全党全国之伟大领袖”的光环在身，更有林彪所统帅的军队作后盾呢！

第二、如果说刘、邓要接受斯大林的“教训”，毛泽东则要吸收斯大林的“经验”。因为，刘、邓为自己这一路“开国功臣”着想，必须防止毛象斯大林那样，也对他们进行一场“大清洗”，从而将他们这些共产革命家也推进共产革命的地狱；而毛面对着“刘家党”试图对他抢班夺权，便一定要以斯大林为榜样，来一场“大清洗”，以消除眼前的危险和“身后”的危机——毛当然担心自己死后，他的这班人马对他会象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一样。好在斯大林为毛早就准备好了对付自己人的整杀经验。这就是斯大林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发动的那一场“政治大清洗”。

为了验证毛是如何接受了斯大林的政治经验的，我以为有必要将斯大林的政治大清洗作一个简单的介绍。这样，我们才会对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残酷过程，特别是对什么才叫做共产革命，有一个更加明晰的历史性认知。

一是斯大林大政治大清洗的时间范畴。斯大林对内的政治清洗，应该说伴随着他上台和掌

权的整个过程。但被称为“大清洗”的岁月，也就是高峰期，则是在1936年9月到1938年8月之间。

二是斯大林政治大清洗的表面理由即导火线。一个是暗杀事件，即1934年12月1日，列宁格勒州委书记谢尔盖·基洛夫遇刺身亡；另一个是斯大林藉口希特勒有可能发动对苏联的侵略战争。前者使斯大林有了对内大抓阶级斗争和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由头，后者则使斯大林有了为保卫苏联而必须肃清内部叛徒和特务的理由。

三是斯大林政治大清洗的内在原因。说白了，就是斯大林要“清除异己”。因为，斯大林接列宁的班，首先用的是欺骗的方法。他在和那些资历与自己不相上下，甚至有些人比他更拥有接班的影响、地位和权力的时候，曾狡猾地提出了“列宁的事业，不是一个人可以接班的，而只能由我们集体地来继承”。这在当时，不仅对接班可能产生的争执甚至内讧起到了缓解的作俑，更为斯大林在此后各个击破和走向独裁埋下了伏笔。正因为如此，斯大林才一步一步地在对苏共党内的清洗中，夺取了最高的权力，但也因此而制造下了党内的不满，甚至是同伙们的长期抗争。三十年代，当斯大林的独裁权力终于已经完全稳定下来时，他便要展开一场大清洗，来解决他的宿敌，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了。

四是大清洗的对象、手段与结果。首先是对内：斯大林制造了一个“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恐怖中心”和“托洛茨基右派集团”、即莫须有的“托派”。犹如毛泽东后来所制造的“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和“六十一个叛徒集团”一样。为了清洗这个“中心”和“集团”，斯大林将1917年俄共“十月革命”时的六位政治局成员中的四个人处决，将六人中仅存的托洛茨基开除党籍。托洛茨基后来虽然逃到了墨西哥，却仍然于1940年被斯大林派人将他暗杀。

斯大林还将自1917年“十月革命”到1924年列宁逝世期间被选入政治局的四名委员处决；另一人米哈伊尔·汤姆斯基被迫自杀，七人中惟有莫洛托夫和加里宁两人幸存。

斯大林对他的中央委员会也进行了大清洗。1934年参加苏共第17大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被捕，几乎所有这些人或被处决、或遭迫害而死于狱中。这个比例与毛泽东清洗他的中央委员们颇为相似。但斯大林用的是“硬刀子”杀人的手段，毛泽东则用的是“软刀子”整死的手段，毛的中央委员没有那末多被公开处决和迫害至死。

斯大林没有放过他的军队。红军五位元帅中的3位，15位陆军将军中的13位，九位海军上将中的8位，57位军长中的50位，186位师长中的154位，全部16位陆军政治委员，28位军政治委员中的25位，均在清洗中被撤职。著名的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元帅被处决。原因是斯大林要借机将参加过共产革命，曾为共产党推翻“俄罗斯共和国”卖过命的，原沙皇俄国的旧军官们，斩尽杀绝。这一点，中共和毛泽东早就在抗美援朝中和后来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全部做到了。而且在文革中，被饿死的彭德怀将军，被活活打死的张学思将军（张学良之弟），被逼迫跳井的陶勇将军等等，其数目也相当可观。中共文革尚未解密，确切的数字还无法出台公布。

在大清洗中，共产革命元勋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曾当面向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和叶果夫提出愿意“认罪”，条件是希望政治局保证他们及其亲人不被杀害。虽然斯大林表面上答应给予他们这个保证，但是事后他们和他们的亲人还是被关押和枪毙。著名的共产党领袖布哈林也同意以家属不受害为“认罪”条件，但他的妻子还是被关进了劳改营。毛泽东在文革大清洗中的狠劲，与斯大林如出一辙。

其次是对外。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在前苏联，虽然富农“作为阶级已经被消灭”，这是斯大林曾亲自宣布的。但是，1937年7月30日，即在斯大林的政治大清洗最疯狂的时候，前苏联的秘密警察还是发布了第00447号针对“原富农”、“富农帮凶”和其它反苏联分子的命令。这个命令后来成为前苏联秘密警察镇压人民的“依据”。斯大林用重新制造阶级斗争的方法，来保卫他的政治大清洗能够顺利进行，以免他对内部的大清洗，可能造成外部“阶级敌人”趁机造反甚至推翻共产党政权的大好机遇。对此，发动文革、旨在对中共党内进行大清洗的毛泽东心领神会。他在文革中，始终都是把大抓阶级斗争、持续地残酷镇压“新旧阶级敌人”当作大事来抓。我在后面将会专门谈及。

在大清洗中，前苏联秘密警察根据斯大林的旨意，是按照一定的数量比例（计划杀人数字）来屠杀少数民族人民的。同时，前苏联的上级军官们，也是按照一定的统计数据，来下令当地的秘密警察关押和处决一定数量的“反革命份子”的。这一手，毛泽东早已学会。他在1949年以后中共所发动的历次运动中，都曾亲自规定杀人的比例数字。在文革中，他更是变本加厉。

斯大林死后，在前苏共准备召开第20次党代会时，苏共党内有一个特殊委员会曾下令内政部统计斯大林在大清洗中的杀人数目。结果，这个来自苏共官方的统计数字指明，仅1937年至1938年一年中，斯大林本人就签署了681，692人的处决令。后来，一个重要的俄罗斯人权组织公布了前苏联遭遇政治迫害者的名单，这个名单中，共纪录有1，345，796个俄罗斯人的名字。相比之下，毛泽东在文革中杀人的“成就”要比斯大林大得多。

## 2、中共拥有大胆嗜杀和制造内讧的双重历史经验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有一句“最高指示”，叫做“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而毛泽东本人，对中国古代线装书中所纪录的“皇帝杀功臣”的故事，特别是历代流民造反“大造内讧、大开杀戒”的经验，非但知之甚多，而且身体力行。

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贫下中农出身的朱元璋，就是为了给自己的儿子拔除“接班的蒺藜”，才干出了“火烧功臣楼”的“壮举”，几乎将大明王朝的开国功臣们屠杀一尽。毛泽东在做了“开国的主席”之后，不仅早已在一步步地“杀功臣”，诸如打击高岗反党集团、打击彭德怀反党集团等；而且在文革中，发动群众斗跨、更斗死了太多的“开国老干部”们……

太平天国的天王洪秀全，就是利用韦昌辉杀掉了大权在握的东王杨秀清，然后又自己动手杀掉了韦昌辉的。这与毛泽东先利用林彪除掉刘少奇，然后再自己动手“逼迫林彪从天掉下来”，并无两样。至于中共和毛泽东所发动和领导的那一场现代农民造反，实际是“流民”造反，以及他们那个在欧洲共产主义革命的旗下，因在中国造反成功所篡立的北京洋教专制政权，又是如何兼收并蓄地吸取了黄巢、张献忠、李自成、洪秀全们，和欧洲共产革命历史上诸如法国的巴贝夫革命、法国的巴黎公社造反，以及俄国列宁的十月背叛，所共同拥有的实行残酷嗜杀与制造血腥内讧经验的，我今天就不再细说了。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还包含着毛泽东自己从事和领导中国共产革命的残忍历史经验。

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当中国共产党服从前苏共和斯大林的命令，在中国发动工农革命，发动武装暴动，篡立“认苏联为祖国的苏维埃政权”，甚至为了分裂中国而篡立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时候，毛泽东自己就曾遵照前苏共的命令，在他亲自发动的“富田事变”中，一次就残杀过自己党人达十万之多。至于其时在斯大林的命令下，他们在江西“苏区”和所有的“苏区”，即“前苏联通过第三共产国际中国支部——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占领和夺权的地区”，杀A

B团，杀托洛斯基派，杀社会民主党，就更是令人瞩目惊心。特别是后来，在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延安整风”这一长达四年的杀人整人运动中，共产党对自己人的迫害和杀戮，与后来毛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几乎没有两样（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阅贝聿聿先生着的《中国左祸》及《谁是新中国》一书的相关章节）。中共领袖王明，就在他的《中共五十年》这一本书中，指斥毛泽东在延安发动的“整风”，就是毛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预演”。只不过，延安整风的第一个打倒对象是他王明；而文化大革命第一个要打倒的，则是曾帮助毛泽东打倒了王明的刘少奇。

毛泽东在他所学到手的和曾亲自创造的历史经验中，得出了两个无往而不败的经验：一个就是“谁狠谁赢”，另一个则是“谁会搞阴谋，谁赢”。这两条重要的历史经验，毛泽东在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全部都用上了，也全部都用“对”了。刘少奇输就输在他与毛泽东相比，还不够“狠”、也不够“阴”。

### 3、中共拥有“欺骗群众和运动群众”的重要历史经验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还有一个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历史经验。这就是他比列宁和斯大林更具有“欺骗群众和运动群众”的丰富历史经验，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当然，这与中国自辛亥之后的复杂历史进程，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革命本身所具有的巨大欺骗性，有很大的关系。

我只想简单提及的是：1935年北京的“12·9”运动，根本就不是一场“抗日救国”的学生运动，而是共产党阴谋策划和公开发动的一场“抗日救共”运动。但“抗日是假，救共是真”。不过是藉口抗日，以实行自救（可参阅《谁是新中国》一书的相关章节）。这个运动的最高策划者，就是刘少奇。刘正是因为这一历史的“大功劳”，才获得了共产党“白区工作模范的光荣称号”。问题是，太多幼稚的青年学生，不仅被他们欺骗了，而且被他们大大地“运动”了一番，甚至影响深远。

在1937至1945年的“大中华民国的伟大卫国战争”中，共产党的党用文艺家们，虽然创作了太多美丽豪迈的抗日文艺，诸如“黄河大合唱”、“游击队之歌”等等，但是，共产党和毛泽东却“不是决心从蒋抗日，而是决策日蒋火并”；“不是游击战，而是游而不战”；“不是抗日和真抗战，而是不抗日、假抗战和谋扩张”；“不是要消灭日本侵略者，而是要与日本侵略者暗通款曲、出卖正在浴血抗日的大中华民国”；“不是开展大生产运动以坚持抗战，而是大种鸦片在359旅驻地的南泥湾”——既要毒害日本占领区和中国共产党大后方的本国人民，更要用卖鸦片钱来“揍国民党”（参阅佛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虽然花篮里的鸦片“香”遍了南泥湾，“香”遍了陕北，甚至“香”到了“解放后”和全中国大陆，甚至一直“香”到了今天的台湾和海外……。人民不仅被共产党欺骗了，而且被共产党“运动”起来，“歌颂中共领导全中国人民走向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伟大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人民还被共产党“运动”起来，人人（包括众多民运人士在内）都会诬蔑、指骂曾为国、为民殊死抗战的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不抵抗”，竟然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之久……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全面投降之夜，明明是共产党立即在“毛管区”发动了内战，却又是共产党从此在“蒋管区”发动了长期的“反内战”的学生运动和群众运动。中共的党史学家们早就学着他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和周恩来异口同声地赞颂道：“1945至1949年的三大学生运动，不仅是我党点燃的烈火……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而且是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三大战役的直接配合……”。但是，当年的年青学生们，还是被他们大大地欺骗了，更为他们热烈地“运动”起来了。我那个一九四八年考进北京大学的大哥，后来的“反动学术权威”和南开大学名教授，当时就是“三菜一汤白面馒头”吃得饱

饱的之后，便跟着共产党的地下党们上街“反饥饿”去了（可参阅《谁是新中国》一书的相关章节和国内更多反思1945至1949中共学生运动的著述）……

还需要我把类似的例子再举下去吗？1949年之后直至文革前，共产党和毛泽东历次“运动群众的成功历史经验”，我看就不用说了吧！朋友们，千万不要小视共产党和毛泽东的这些重要的和丰富的“历史经验”。正是这些历史的阴谋与谋略及其一再地大获成功，才造就了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敢于发动文革以拼死一搏的“胆量”和“决心”。

## 五、中共敢于发动文革的“社会基础”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之所以敢于发动一场被他们自己称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则一定要有一个相应的、即可以容许他发动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一言以蔽之，就是文革前十七年中共复辟专制制度的成功，和文革前十七年中共专制极权统治所已经获得的可怕成就。

### 1、在思想上

第一、文革前十七年，中共已经用刺刀下的强迫改造，成功地将一家外族外国的反动倒退思想，变成了当代中国独一无二的“专制统治思想”。“独尊西洋马列与杀尽中国百家”之教政合一的思想统治局面，已经完全形成。中国人民因已经丧尽思想舆论自由，而完全失去了曾经拥有过的自由民主思想，更失去了产生新反抗思想的可能。即便在思想上还有零星的反抗者，他们也只能从马列中去找，即在马列中寻找所谓反抗的思想武器，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其结果当然是“必被红旗所打倒”。直到文革期间，反江青的，反林彪的，诸如张志新这样的勇士都是这样。这与欧洲中世纪被屠杀在宗教裁判所里的非原教旨主义信徒们，其慷慨和悲哀并无两样。

第二、正因为如此，在文革十七年间，整整一代对马列狂信狂从的青年，已经日渐地成为中共领袖毛泽东发动那一场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基础。十七年间绝对的和残酷的阶级斗争教育，已经开花结果。文革伊始，原来看上去文质彬彬的青年学生，甚至是年青的大中小学教师——青年知识份子们，在转眼之间就能够集体性地翻然一变，而成为残酷的打手，残忍的杀手。他们斗先生，打老师；揭发父母，斗争亲人；不仅彻底埋葬了中国几千年“尊师”的优秀传统和人伦道德，而且疯狂地践踏了现代文明中起码的人权规范和人格尊严。说到底，就是因为文革前十七年，毛泽东和共产党早就把他们“培养”好了。著名的文革史研究专家王友琴教授，曾在她的“摧毁革命的日记”（《黄花岗杂志》第18期）这篇文革研究专著中记述道：

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学有学生发起了对六十多个“黑帮”的暴力攻击。这也是文革中北京大学发生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暴力“斗争”。斗人者把厕所里的垃圾篓子套在被斗者头上，强迫被斗者下跪，撕破被斗者的衣服，等等。7月25和26日，毛泽东的妻子江青等到北大宣布“618事件”是“革命事件”，从而直接导致了1966年8月红卫兵的残暴杀戮，在北京有数千人被活活打死。在北大，此后几次“纪念”这一事件，都把这个日子当作一种“光荣”来纪念和庆祝。每次“纪念”都伴有“斗争会”，简直象是“助兴节目”一样……1968年6月18日，被关在北大“牛棚”里的人被叫出“开会”。从未名湖边的“临湖轩”开始，校园甬道两边是密密麻麻的人，排了几百米长。那些人手里拿着棍子、树枝和铜头皮带。“牛鬼蛇神”们排成队从路上走过，被夹在中间。棍子鞭子雨点一样落下来。他们都低头弯腰，只看到甬道两边很多人的脚……走过这种“夹鞭刑”后，单衣被打烂了，双臂皮开肉绽……王力等著名教授（被打得）满身血痕……

北大的此一景象，在当时的中国大陆可谓是极普遍的现象，与广西等地学生公开杀害老师、甚至吃老师的肉相比（参见郑义的《红色纪念碑》一书），应该说还算是“比较文明”的。但仅此，我也已经可以说，没有十七年共产党的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的残酷教育，特别是这一长期的教育已经彻底地扭曲了一代青年的心灵和人性，使他们丧尽了正常的道德良心和理义廉耻感，这样的事情就绝对不会发生，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也就不可能发动得起来。

## 2、在政治上

第一、文革前十七年间，由于中共马列思想统治的建立和确立，从而在“革命的名义”之下，完全地确认、确立了共产党的“教政合一”式极端反动统治。这个“教政合一”的极端反动政治，自然就是被“苏化”了的、欧洲中世纪黑暗的“教政合一”政治，当然为五千年的中国政治历史所从来就没有有过。它无疑为共产党发动文革准备了一个最反动、也是最血腥的思想枷锁和政治枷锁。文革当中，被共产党处决在反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旗号下的“思想犯”，究竟有多少个“千千万万”，还是要等到中共垮台，共产党文革杀人档案解密，和中国人民有了揭发共产党杀人的自由时，才能够彻底地搞清楚。

第二、文革前十七年间，共产党在“革命的名义”下，完成了对党内进行“等级分封”和对党外进行“阶级划分”的共产革命使命，对中国历史上早在“秦汉之间就已经被废除的封建制”，进行了一次超级的和极端的复辟。十七年间，将“出身和成份”提高到了封建的大周朝都绝不能达到的“水平”。一方面，他为共产党的“裂民而治”，实行镇压，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另一方面，则为共产党和毛泽东要发动文革而利用“血统论”，和“血统论”在文革中的猖狂泛滥，做足了准备。文革伊始，那一句“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反动无耻叫嚣，曾吓怕了多少可怜的人心，又制造了多少的人间悲剧。就不说那个虚伪的“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和重在政治表现”的“最高指示”，又为当代青年制造了多少无边的人生痛苦和怎样的悲剧命运！

第三、文革前十七年间，中共和毛泽东为建立和巩固他们的反动黑暗统治，曾发动了十数次政治运动，已经造成至少六千万人死于被迫害、被陷害、被杀害和被饿死的“非命”。如果说初始的零星反抗还曾存在，1957年之后，则任何的反抗都已经成为不可能。1959至1962年的三年“人祸”已经饿死了至少4300万人，都没有人敢于造反，这在中国的历史上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原因很简单，就是人命只有一条，蝼蚁尚且贪生，而共产党却绝不在乎杀人和杀多少人。由是，中国大陆人民不得不在屠刀之下苟延性命。无数的人，不单是形形色色被共产党划定为“阶级敌人”的人，“成份不好”的人，甚至包括“成份不坏”的人，直至是共产党自己的许多大小官僚，也都是活得胆颤心惊，如履薄冰。这就是文革一经发动，则人人色变，个个心惊，谁都不敢、也不会、更不可能反抗的根本原因。当然，这种已经造就的时代人心和社会基础，对文革的发动者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来说，自然是再好也没有的了。因为，中国大陆人民已经完全陷落到了可以“任其驱使、随其摆布”的境地。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种社会基础，文革的发动当然是不可想象的。

第四、文革前十七年，共产党和毛泽东曾在各种“革命的名义”之下，连续发动了十数场政治运动，从而日渐形成了“运动即是革命、运动就是法律”的不成文“定律”，即社会不得已的习惯性认知。只要运动一来，人民都知道，又要整人了，又要死人了，又有一批人要被批判、斗争、逮捕甚至处决了。大多数人又要加倍地小心谨慎，以免祸从天降。另一部份人，则认为整人的时候又到了，又有了“发达”的机会了。因为造谣、诬蔑、陷害非但不犯法，而且受保护、受表彰。十七年间，多少人是因为遭受诬蔑和陷害而丧失了自己的性命和自由，为无产阶级所专政；又有多少人因为敢于毫无忌惮地害人，而平步青云、得意非凡；还有多少人，仅仅是为保全一己之性命，或仅仅是为了自己和家人的起码生存权力，而不得不揭发陷害他人，直

至也成了共产党的“可怜打手”。这就为文革一“开打”，就有无数人遭遇迫害和太多人敢于迫害，奠定了极其广阔和及其残酷的社会基础。当然，这是一个黑暗透顶的社会基础，却是共产党和毛泽东发动文革所必不可少的血腥政治条件和无耻社会环境。它几乎为整个文革期间的“无法无天”、“无边陷害”和“血腥镇压”，提供了所有的方便，奠定了所有的基础。

### 3、在文化上

第一、文革前十七年间，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独尊马列”的绝对专制统治，既然已经导致“杀尽百家”的恶果，那末，中共在整个文化上的专制统治，也就必然要成为五千年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又一个“史无前例”。此尤不算，更恶劣和更无耻的却是，他竟用一家外族反动文化，不仅对中国人民实行了空前的残酷文化统治，而且对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和文化，予以了全方位的栽脏、否定、污辱、践踏、直至公开号召焚毁。

只因为对世界极其无知的马克思，认为人类各民族历史都只有“五大历史阶段”，所以，中共便要将中国自秦之后的两千多年早已“废了封建、置了郡县”的历史，甚至包括“推翻了君主帝制、创建了民主共和”的我大中华民国历史，都要全部纳入“封建”的历史范畴，以为马列作证；只因为马列要全世界的共产党人都必须与本民族的“一切传统观念作最彻底的决裂”，中国共产党就对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一杆子打倒，横加批判、否定、诬蔑和抛弃。只因为马列要反对所有的资产阶级文化，不论它是否西方进步文明，中国共产党都要坚决地以反对一切资产阶级文化为名，将晚清民初以来从西方传播到中国的所有西方文化，都当作批判、否定和驱除的对象，并对现代的西方文化施行严酷的“封关禁海”。他唯一必须尊奉、捍卫甚至还要创造性发展的，就是那个反动的、倒退的和专制的马列文化。直至把整个中国，真正史无前例地变成了一个“言必称马列、书必证马列、事必奉马列”的马列洋教专制国家。这就为在文革开始以后，进一步将中国变成也要“言必称毛思想、书必证毛思想、事必奉毛思想”做好了铺垫和准备。因为，毛泽东思想才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顶峰”。这些话听起来挺肉麻，但共产党、造反派就是这么说的和喊的。

第二、文革前十七年间，中国共产党和他的领袖毛泽东，不仅要用马列文化杀尽所有文化，不论是“古”还是“今”，更不论是“东”还是“西”，除掉西边的马克思以外；而且，他还必然地和要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所谓文化理论，特别是列宁和斯大林的文化统治手段。将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的原则、“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任务，斯大林的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理论，操之在手。一方面，用党将文化死死地管制了起来，一方面则迅速地为建设起一支独一无二的专制文化队伍。从此，文化就成了真正的党的文化，既要由党来领导，又要由党的文艺家来制造。文革前十七年间，文化已经完全地堕落成了“中共共产革命杀人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可以说，政治上有一风吹草动，文化界就大张旗鼓。文化不仅成了共产党的工具和玩偶，而且成了共产党镇压和杀人的道具、武器和对象。所谓创作自由，不过是一篇篇骗人的鬼话罢了。这才是文革前十七年的全部文艺作品均毫无生命力的根本原因，更无需大谈什么文艺作品的“永久魅力”（马克思语）了。共产党的著名作家李准，就是名噪一时的电影“李双双”的编剧，他在1979年全国文代会上就曾说过，“我人还没有死，作品早就死光了”。他的感叹之语，可谓那个时代文艺作品的命运写照。

第三、如前所述，既然文化只能是党的文化，文化团体都为党所领导，创作什么，表现什么，是好还是坏，都要由党说了算，于是，一个顺理成章的文化现状，即专制愚昧文化的文化形态遂迅速成形，专制愚昧文化的绝对“市场”终于形成。一言以蔽之，就是专制愚昧文化已经成为社会的唯一文化形态。所以，在文革前十七年，就只有歌颂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文化，只有歌颂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只有歌颂中国共产党革命即中国共产革命历史的



文化，只有揭露批判和否定“旧社会、旧中国”和中华民族历史的文化，只有卖力歌颂前苏联及其领袖列宁和斯大林“更加伟大光荣正确”的文化和彻底批判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及生活内容的文化了……。从此，文化不仅是单一的，而且是专制的，尤其是蛮横和残忍的。因为只要谁敢在文化的创造和传播中，违背了上述的“原则”，无产阶级的“刀把子”自然会毫不留情。文革前十七年因从事文艺创作和文艺研究而遭遇了共产党“刀把子”——从而在历次文艺整杀和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批判、被斗争、甚至是被迫害至死的大批文艺家们，早已为文革伊始就立即更大规模地和更加疯狂地迫害文化人，拉开了血淋淋的序幕，奏响了惊心动魄的序曲……

第四、正是因为专制的文化形态已经是文革前十七年中国大陆文化的唯一形态，所以，当毛泽东要大搞个人崇拜，并要借助文化来为他发动党内斗争作准备、甚至是寻找“突破口”时，早就因为共产革命文艺家的卖力歌颂，特别是以郭沫若为首的一群无耻文人的肉麻歌颂，而成了“红太阳”的毛泽东，终于直接了当地、并且是不顾廉耻地将对他个人的“歌颂文化”，推向了“造神文化”的高峰。一九六四年，一出不惜篡改党史以专门歌颂毛泽东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终于登台亮相。它不仅是毛泽东用文艺形式，对党内反对个人崇拜势力的公开政治还击；而且是毛泽东为“设定最高政治是非的界限”所利用的，最具有宣传性和最具有煽动性的政治手段。文革中，刘少奇等中共党人之所以会不堪一击，实在与毛泽东善于抓文艺制造自己神话般的“光辉形象”，关系甚大。对此，我在后面还要专门说到。当然，毛泽东在六十年代上半期发动和制造的“造神文化”，自然将文革前的专制愚昧文化推向了它的顶峰。这种愚昧文化对整个中国社会和全部世道人心，特别是对成长中青少年的巨大而又恶劣的影响，终于在接踵而来的文革浩劫中，起到了难以想象的可怕作用。

#### 4、在经济上

第一、我们中国的读书人，都知道孟子有一句名言，就是“制民之产”。就是说，统治者不仅要保护老百姓的财产，而且还要帮助老百姓“增加财产”。这样，人民才能够不受饥寒、不受奴役，国家和社会也才能够得到安宁和发展。但是、只认马列为“祖宗”、前苏联为“祖国”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却从“革命”伊始，特别是开国伊始，就通过种种的政治手段，将全体人民的吃穿住行全部地管起来，全部地管死了。也就是说，人民在其生活的一切方面，都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接受共产党的分配，为共产党所控制，为共产党所制裁。文革前十七年间，中国大陆的所有人民，吃饭要粮票，穿衣要布票，烧煤要煤票，结婚要批准，讨饭要介绍……。也就是说，人民连结婚都必须先要得到本单位党的领导批准，然后才能去区政府领结婚证。农民要出门讨饭时，也必须首先得到共产党的大队书记开介绍信允许，才能获得出门讨饭的权力，否则就极有可能被当成流氓或流串分子而被专政机关收捕，甚至判刑劳改。人民要到外地探亲，还得请求共产党允许他将本地粮票换成全省和全国粮票……。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人民的一切人身权力早已经是荡然无存。而失去了一切人身权力的人民，当他们连吃饭和穿衣都必须求得共产党的施舍和必须接受共产党的控制之时，难怪在文革前十七年间，就只有共产党一再疯狂整人杀人的运动，而绝无人民反抗造反的可能了。而也正是人民民权的全部丧失，人民能力的全部丧尽，也才为共产党和毛泽东敢于发动那一场文化大革命，奠定了一个至为重要的社会基础。这就是在文革中，之所以会出现“叫你造反你敢造反，叫你造谁的反你只能造谁的反，反正你是死也不敢造我毛泽东的反、死也不敢造我共产党天下的反”这样一些可悲政治现象的根本原因之一。

第二、1971年，当副统帅林彪被毛泽东逼得终于从天上掉了下来之时，毛泽东为了维系自身的权威和权力，曾自作聪明、实则是极为愚蠢地向他的全党和全国发下来一份名字叫做“571工程纪要”的党内文件，揭发了他曾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是如何的反动。就是在这份文件中，透露出了林彪的又一个“反动思想”，就是他认为，毛泽东的残酷统治把共产党的中国搞得“国富民穷”。国是否真富，我们不知道；但民是真穷，我们倒是知道得清清楚楚。因为，

我们都挨过饿，因为我们都穷得叮当响。只要回家看一看你的父母兄姐在文革前的黑白照片，你就会一目了然，就不必要他们再来一次“忆苦思甜”了。但是，林彪说“国富民穷”，还是有根据的。就是他说出了一个数字，即文革前国库存底有八千亿，而这八千亿，就恰恰为毛发动他的“史无前例”，因“大抓革命”，而“难抓生产”，救了大急。换言之，就是这八千亿，为他发动文革、专门整人垫了底。后来，胡耀邦和其它中共领袖都曾在报告中，证明了这个八千亿人民币的存在，和这八千亿人民币确实为毛泽东的十年文革挥霍一尽。所以，文革结束，毛也死了，中国已经是“国空民绝”。但是，若要换一个角度来说，正是人民在十七年中曾惨遭中共盘剥，被逼迫得史无前例地穷苦，才为共产党和毛泽东发动那场“史无前例”，作了经济基础即“革命保证”。

## 六、中共敢于发动文革的“政治保险”

毛泽东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自始至终地和同时并举地抓了“两件大事”。一个就是路线斗争。他曾一再地发布最高指示说：“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他更是一再地要在他的党内号召、发动和进行“路线斗争”，并声称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另一个，就是他曾一贯地、更早地、甚至是持续地号召过和实行过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号召“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甚至高唱“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为什么？

第一，因为只要一谈及党内的路线斗争，毛泽东就是“一贯正确”。这就使他为发动文化大革命而大搞路线斗争，以斗垮斗倒斗烂刘少奇，带来了“胜利的先机”。因为，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特别是1935年毛泽东做了中共的核心和领袖之后，曾有过几次大的路线斗争，但几乎每一次路线斗争，毛泽东都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和路线斗争的胜利者。在1935年元月的遵义会议上，在党内两条不同的“逃跑路线”的斗争中，毛泽东的逃跑路线占了上峰，毛因此而拯救了党、拯救了他们的“革命”，更因此而成为党、特别是军队的领袖。在大中华民国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当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真抗日路线”和毛泽东为代表的“假抗日路线”发生激烈争执时，又是毛泽东的“假抗日路线”获得了胜利，由此毛泽东不仅保存了共产党，而且发展了共产党，尤其是扩张了共产党的地盘。用中共党史专家的话来说，就是“为未来的那一场人民解放战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毛泽东因此虽成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大灾星”，却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大救星”。毛泽东曾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洋洋得意地夸口自己当年不准八路军和新四军真抗日乃是如何英明正确的谈话，已经成为历史的证据（参阅毛泽东前秘书李锐的《庐山会议回忆录》）。毛泽东在这两大路线斗争中的胜利，都救了共产党的命，更造就了毛泽东在党内的绝对领袖地位。特别是第一次他让周恩来从此服从了他，第二次他则让刘少奇成了他最重要的打手。所以，就党的历史、党的命运、毛的历史、毛的“功绩”和毛与刘少奇的“主从关系”来说，只要一谈路线斗争，刘少奇就已经不是他的对手，或者说，刘的腰杆子是硬不起来的。这就为他发动一场要打倒刘少奇的文化大革命，带来了一定的“政治保险”系数。

第二，对毛泽东来说，另一个“政治保险”则更为重要。这个政治保险，就是中共及其领袖毛泽东从来也没有放松过的“制造阶级斗争、调节阶级斗争和狠抓阶级斗争”。因为，有一点是必须明白的，如前所说，就象斯大林在发动对党内的大清洗时，必须同时残酷镇压共产党外的“阶级敌人”、实际上的无辜人民一样；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的目的，虽然只是为了打倒刘少奇，却绝不容许共产党的“阶级敌人”乘机捣乱和破坏，直至对他和共产党的专制统治制造不安和危险。因此，斯大林为了保证对内政治大清洗的成功，便在他自己曾宣布“已经消灭了阶级的前苏联”，重新制造出了一大批阶级敌人，以供他“杀害”，籍以稳固他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毛泽东则要在从来没有停止过的大抓阶级斗争的同时，进一步地和更疯狂地提出来“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因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即只要敢于大肆进行“阶级屠杀”，全中国就谁也不敢“乱说乱动”了，这就自然为他发动文革作了“政治保险”。因为

他绝不能在打倒了刘少奇的同时，竟让共产党和他自己的专制统治也被人民乘机推翻。这是他必须顾虑到的，也是他必须严加预防的。更何况，毛泽东一向拥有制造阶级斗争和调节阶级斗争的成功历史经验呢！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艰难的卫国战争中，就曾为了说服他的党徒不抗日，假抗日，求扩张，大出卖，曾经大谈“民族斗争说到底就是阶级斗争问题”和“阶级斗争是可以调节的”的理论，以为他的共产党在全民抗战中，“决策不打日寇、专打抗日的国民党”，和“决策日蒋火并、绝不帮助蒋介石抗日”，在党内扫清了思想障碍。他因此曾大获成功……。所以，1962年，当中国大陆人民刚刚才从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过来，只因毛泽东已经有心要发动一场政治浩劫以整杀刘少奇，毛就开始高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了。此后，一直到他死，特别是在文革恶浪起伏、社会血腥弥漫的那些岁月里面，毛泽东更是一贯地、连续地和从未放松过的高喊“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一贯地、连续地、极其残酷地和一次又一次地将无数无辜的人民按杀在他那把“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屠刀之下，以确保他对党内发动路线斗争的绝对胜利和全面成功。对此，在我讲到“中共发动文革的谋略和过程”时，再详细谈及。

（下篇待续）

□ 原载《黄花岗》第十九期 2006年12月27日

~~~~~

# 【文革点滴】

## 电影《海霞》诞生记

• 袁成亮 •

“大海边，沙滩上，风吹榕树沙沙响。渔家姑娘在海边，织呀织渔网织呀么织渔网……”一提起《海霞》这部影片，相信已过而立之年的人耳边就会响起影片中这首旋律优美、曲调婉转的插曲《渔家姑娘在海边》。这首歌与电影《海霞》一起，以其清新的艺术风格在当时引起了轰动，它与同期的《创业》、《闪闪的红星》等影片一起被认为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为数不多的几部优秀影片。然而，就是这样一部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优秀影片，在其创作及上映的过程中，却经历了常人难以想像的艰辛和波折。笔者就此作一披露，以飨读者。

—

“文化大革命”前期，以“文化革命旗手”自居的江青在舞台上大搞“样板戏”，并由此形成了八亿人民八台戏，样板戏“一花独放”的局面。一些长期从事故事片摄制的老同志对此十分不满。1971年5月20日，长于故事片拍摄的导演谢铁骊借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9周年之际同导演成荫、摄影钱江联名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反映广大工农兵群众对故事片的迫切要求，并就如何抓好故事片摄制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周恩来收到信后，十分重视，立即将此信批转给江青。正是由于周恩来的干预，1972年，由江青掌管的国务院文化组这才决定恢复故事片的生产。

文化组恢复故事片拍摄的决定一下达，各电影制片厂便闻风而动。谢铁骊更是兴奋不已，到处寻找故事片的材料。一天，他见女儿正在津津有味地读一本书，拿过来一看，原来是南京军区作家黎汝清创作的小说《海岛女民兵》，便迫不及待地看了起来。这本书讲述的是渔家孤女李海霞在党的哺育下，在与渔霸陈占鳌、潜伏敌特刘阿太等敌人的斗争中，逐渐成长为一名成熟的革命女战士的故事。谢铁骊看完后觉得这是个拍片的好题材，主题好，有生活，内容也很健康，而且在当时阶级斗争一统天下的局面下，拍这样的片子政治上也比较保险，不会出问题。

他很快将它改成了电影文学剧本《海霞》。正在“等米下锅”的北京电影制片厂也立即将其列入了拍摄计划。谢铁骊随后组建了《海霞》摄制组。刚刚从干校回厂的王好为进入导演组，成了他的副手。他的老搭档钱江负责摄影。班子搭好后，谢铁骊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演员选拔，最后确定由“文化大革命”前已经成名的王苏娅出任女配角阿洪嫂，在北京前门一家副食店发现的张力维饰演彩珠，从北京的一所小学里找到蔡明出演小海霞，天津的中学生洪学敏扮演玉秀。戏中女主角海霞原打算由谢芳扮演，但由于她的年龄偏大，后来改由福建省京剧团的吴海燕扮演。为了充分把握影片的主题，1972年8月，谢铁骊带着钱江、王好为出京南下，头站抵达南京，与《海岛女民兵》的作者黎汝清交换改编《海霞》剧作的意见；然后转至温州，和小说女主人公海霞的原型汪月霞交谈，考察女民兵们的学习与工作，深入生活；随后一路向南，路经浙江、福建、广东，挑选外景地。此次出访，历时月余，一路上精神抖擞，大有不把此片拍成一流影片不罢休的气势。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正当谢铁骊全力投入《海霞》拍摄时，江青的一个调令却将他调到了样板戏《海港》剧组担任导演。临行之前，谢铁骊对王好为等人千叮咛，万嘱咐，要他们培训好演员，继续寻找合适的外景地，做好拍摄《海霞》的前期工作，待他回来后立即投入拍摄。1973年4月，谢铁骊拍完《海港》后急匆匆地赶回了《海霞》摄制组。然而，正当他准备重新启动《海霞》的拍摄时，江青又要调他去拍《杜鹃山》。无奈之下，谢铁骊只好将拍摄《海霞》的任务交给了另一位北影导演凌子风。凌子风接手后立即南下来到了《海霞》外景地。时值初冬，南方的海水仍有些温意，台风过后，海岛上气候宜人，正是拍摄的好时节。凌子风奋战半月有余，积聚了小半部的《海霞》样片。按照惯例，他让王好为携着已拍好的小半部样片返京送审。不料，送审未通过，摄制组被勒令撤回京城。凌子风执导的第一次《海霞》拍摄行动半途而废。

凌子风拍片失败，这下可急坏了谢铁骊。他马上找到钱江家，对钱江说：“看来我是没办法拍《海霞》了，还是你来。导演是你，摄影是你，整个摄制组组长也是你，《海霞》就交给你了！”但此事并非谢铁骊所能做主，在当时的情形下，钱江对拍《海霞》一事也是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么一耽搁，一年又过去了。直到1974年7月，由于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的努力，《海霞》才又重新被列入拍摄计划。谢铁骊一拍完《磐石湾》后，便立即赶到《海霞》剧组，投入了紧张的拍摄工作中。这次他将外景地选在了福建一个风景秀丽的海滩。为了保证拍摄安全，摄制组还与当地驻军联系成立了协拍小组，以与剧组相同的人数比例配备医疗和游泳救生人员，并严格规定演员们不能随便下水。在影片拍摄过程中，战士们都很尽责，一个演员下水，周围马上就聚拢了五六个前来保护的战士。尽管如此，剧组里的演员大多是二十岁左右的姑娘，活泼好动，尤其是见了湛蓝的海水，哪里还管得了自己？有几个女孩子因偷偷跑到海边游泳，结果受到了一顿严厉的批评。

经过一番紧张的劳作，1975年初，谢铁骊终于完成了《海霞》的拍摄。这是他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拍摄的第一部故事片，而且自我感觉拍得不错，他对影片送审充满了信心。事实上，谢铁骊在这部影片中越出了当时“左”的文艺桎梏，在结构上采用“非戏剧化”和“散文化”的表现手法，把民族风格和电影表现手法相结合，以景写情，情景交融，充满了抒情诗的色彩和情调，这在当时的电影拍摄艺术上是一个很大突破。

## 二

尽管谢铁骊对影片《海霞》很有信心，然而当片子送到文化部后，掌控文化部的于会泳、刘庆棠等人审看后仍大为不满。文化部对《海霞》的审查意见是：主题不鲜明、不集中、不深刻；一号人物海霞没有树立起来；没有按照“三突出”以及“三陪衬”的原则处理一号人物和其他人物的关系。在审查中，文化部还提出了有两场戏必须改动：一场是指导员受伤的戏。这

场戏讲的是在战斗中中海霞到前线阵地给解放军送水，指导员为了掩护她而受了伤的事。于会泳等人认为这违反了“三突出”原则，突出了指导员，使一号人物海霞“受贬”，应该突出海霞，让她负伤。另一场是解放军在海霞家吃野菜戏。解放军解放了海岛，来到海霞家里，指导员看见海霞煮了一锅野菜，就让战士们每人吃了一碗，全部吃光。海霞感到不理解，正在生气时，指导员给她端来一大碗白米饭，充满深情地说：“小妹妹，我们就是为了不让你们过这样的苦日子才到这里来的。”海霞感动得流下了热泪。这场戏被指责为违反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拿穷人开心”。这两场戏“歪曲人民解放军”，“诬蔑了解放军的形象”，“给英雄人物脸上抹黑”。此外，老民兵旺发爷爷给青年民兵讲传统，对海霞进行教育，是“英雄人物陪衬次要人物”。于会泳因此责令北京电影制片厂“要从方向路线高度加以认识”，“把坏事变好事”，对影片进行修改。文化部的审查结果给了谢铁骊当头一棒。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好的戏却被文化部“糟蹋”成这个样子。正当谢铁骊为此伤心不已时，事情又出现了转机。专门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播放电影的原北影厂职工周恒，为了“调剂”领导们的生活，以“给周总理放片”为名，通过文化部值班室到厂里借调还未通过的影片，并称：“总理身体不好，可能一次只能看一两本，片子要多放几天再还。”周恩来当时刚做完一次大手术，看了《海霞》后大为欣赏，朱德、叶剑英、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闻知后，也相继调看了《海霞》，并对影片给予了高度评价。对于文化部指控编导在“吃野菜”一场戏里“违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朱德很不以为然，他毫不客气地批评文化部说：“他们懂什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就叫破坏？真是胡扯！”叶剑英看完后将影片借给了总参谋部在较大范围内放映，连放三场，观众好评如潮。邓颖超看后还将《海霞》推荐给中联部，准备用来招待各共产党国家的来宾。

一部未通过的片子竟然放到了国家领导人那里，于会泳得知此事大为恐慌，立即将情况报告给了江青。江青闻言大怒：“是谁把片子往邓颖超那儿送的？她又不管文艺，伸这个手干什么？”于会泳于是将事情一五一十地向江青作了汇报，并说：“我们原本对此片就没有通过，但现在总理、朱委员长、邓颖超都看了，他们都说好，我们也不好再提什么意见了。”江青对此不以为然，便马上授计说：“你们应该有个制度，没完成的影片不准出厂嘛！”

于会泳得到江青的“指点”，便立即派人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将《海霞》底片和样片全部查封，并派专人看守，不许影片外借；又派“调查组”进驻北影厂，找《海霞》剧组创作人员谈话，收集整理中央领导人调看影片的情况材料。并给《海霞》加了两项罪名：一是《海霞》是“文艺黑线回潮”的代表作。二是《海霞》摄制组是“行帮性的导演中心制”，是资产阶级所有制。谢铁骊和钱江对此不服，向江青申诉。他还诘问文化部：“《海霞》在政治上是好的，艺术上也是有创新的，为什么不能通过？”但江青不为所动，并以文化部核心组名义向北影厂连续发去两封公开信，要求立即对《海霞》进行修改。在重重压力下，谢铁骊根据文化部意见对影片修改了一百多个镜头，但对必须“改动的那两场戏”却丝毫未动。1975年6月15日，经过第二次修改的《海霞》送文化部审查，这也是文化部第三次对该片进行审查。于会泳等人当日便看了影片，仍然不予通过。消息传来，住院的谢铁骊忍无可忍，决定状告文化部，并与钱江一起将一封署名的诉状交到了江青那里。江青是文化部的总后台，向江青告文化部无异于“与虎谋皮”。结果文化部派人到北影厂封存了影片的全部底片和样片。在北影厂召开数不清的大会小会上，大肆讨伐谢铁骊，还声称要追查出谢铁骊背后的“黑手”。但谢铁骊并没有屈服，他将申诉信送到了国务院信访局。他在信中驳斥了文化部给《海霞》定下的违反“三突出”的罪状，指责掌管文化部的于会泳和刘庆棠借影片整人。7月25日，他还与钱江联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求他过问。毛泽东在信上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月底，邓小平亲自主持政治局审看了《海霞》，肯定了这部片子，《海霞》终于获得了一张“准映证”。同年8月，在邓小平支持下，历经坎坷的《海霞》在全国公映。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丁凯文（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 0 2 1 — 8 6 0 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